

# 坐飞机

文/余斌

我头一次坐飞机是1986年的事。那年是我的毕业季，其时研究生还金贵，论文尚未答辩，工作已谈妥了，要去一家出版社。

出版界正当黄金岁月，新上任的头摩拳擦掌，要办一份杂志。趁论文答辩前的空当，我们就被派往京师为创刊号组稿。同去的一位是名门之后，有他父辈的人脉，叩开了好几位文坛大佬的门。那哥们报捷表功之余，就提出，回来可以坐飞机了吧？那边极爽快地道：坐！

在当时，按规定处级以上出差才有资格坐飞机，只是“开放搞活”后，执行不那么严格了。比起坐火车、汽车，坐飞机相当之“高大上”。

在小学我就跟小伙伴描述过第一次飞行。是军用教练机。飞行员甚至让我摸了一下操纵杆，就像电影上“战鹰”里的情形。我的虚构似乎很成功，隔天就有人跑来问：“你坐过飞机呀？”眼神里并无质疑，

表情全是羡慕。

有次父亲到广州，回程坐的是飞机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机上供应的吃食原封不动带回了家。于是我们见到了精致的盒子，里面一格一格装着量很少看相很好的几样荤素，有碧绿的荷兰豆，红艳的胡萝卜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荷兰豆。蔬菜怎么可以这样？简直不像烧出来的。对了，里面还有一小块蛋糕，大大地巩固飞机的不凡形象。我还追着父亲问过有关飞机上的其他情况，他似乎有点懒得回答。

就因对飞机的仰视，那次骤然之间，当真要坐飞机了，就莫名兴奋。我记得到了机场，两人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，什么都新鲜。也忙乱，因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手续，比如机票还要换成登机牌之类。不幸的是，在最后关头，发现登机牌找不到了。两人互相埋怨，广播里在催促登机。起飞时间已到，登机牌

仍无踪影，以为我们的“首航”就要以一趟候机厅之游收场了，这时就听广播里径直点我们的名。于是赶到登机闸口，像两个不得已投案自首的犯人。

机场人员核对了证件并训斥了一顿之后，在满机舱人的埋怨中，将我们领到仅空着的两个座位上。晚了十几分钟起飞。在飞机开始滑行的那一刻，我们长吁一口气，知道再不会有意外，有一种死里逃生的庆幸。

这次历险成为飞机为交通工具之最上乘的又一证据。票丢了都没事，乘火车、轮船哪里能够？

当然，后来，飞机在我心目中慢慢掉价了。坐飞机越来越频繁，出远门坐飞机越来越成为一种寻常的选择，机票频繁打折，价格“沦落”到有时甚至低于火车票，相应的是，其他交通工具在升格，飞机要保持冷艳高贵的形象，也只有着落

在漂亮而且礼仪方面训练有素的空姐身上了，虽然后来高铁上女乘务员在向空姐的标准靠拢，而安徽大概是搞形象工程，高速公路收费站皆起用美女，且绝对是比着空姐模子的微笑服务。但这都是提升服务，“取法乎上”的兴措，也就越见得空姐的“高”。

所以坐飞机虽早已平民化，在我这儿，其“高大上”形象的最后颠覆，却是在美国完成。美国的铁路不发达，若非自驾，出远门多半都是飞机。坐飞机简直就像坐长途那么寻常。如此这般的乘、驾两方面也就视若寻常，“空姐”并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职业，也没有那种近乎选美的千挑万选了。2010年我在美国暴走，地儿大，一个月飞了好多趟，在机上看看，哪来的“空姐”？

# 宽容

文/张燕

在医院工作其实压力挺大，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面对的不是物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。

那天上午，我因为孩子小又生病，太闹人了，几乎一夜未睡，第二天上班头昏得两脚好像踩了棉花。王医生开了张处方，是一个沙眼老太太拿两瓶氯霉素眼药水，我随手拿来就把药送到了老太太手上，老太太领了药说了声谢谢，就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心里忽然有点不踏实，再仔细一看，天哪，滴鼻净的包装几乎和眼药水一样，我把滴鼻净当成眼药水发给了病人。心一下子跳到了喉咙口，立刻把我吓了个半死——俗话说眼珠子里揉不得半点沙子，万一老人的眼睛有个好歹，那还了得！

事不宜迟，我沁着一脑门冷汗向药房主任作了汇报，主任一听，眼睛顿时瞪得老大，她来不及训我，赶紧去问医生，好在老太太是个很爱说的人，医生依稀记得，老人说她就住在医院边上的小区，儿女都在国外，家里就是老两口相依为命。我们先和医院附近小区的派出所取得联系，在警察的帮助下，几个人一路寻找、打听，终于在一个小时后，在香榭里小区找到了老太太。好在老人买菜刚归，还没来得及点眼药水……

我低着头，嗫嚅着直给老人赔不是，原以为老人和她丈夫一定会臭骂我一顿，加上现在的人法律意识强了，说不定还会打官司让我付精神赔偿费，对这些，我都做好了思想准备，毕竟是自己错了，老人眼神不好，如果我再晚来一会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没想到，老太太拿起眼药水戴着老花镜细细地一看说：“姑娘呵，也不能全怪你，这个滴鼻净看起来就像眼药水，我要给药厂打电话，让他们改进改进！”我们一再表示歉意，感谢老人的宽宏大量，老人的先生说：“说不上宽宏大量，如果我老婆子眼睛受了伤，我们也一定会讨说法的，但现在什么事也没有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姑娘也又不是故意的，同样也受到了惊吓，心里本来就不好受，我们怎能胡搅蛮缠，得寸进尺呢？再送老婆子也有责任，拿了药也不看！”并请求主任不要为难我，说有了一次这样的经历，在以后的工作中她会铭记一辈子的。

回来的路上，想起一句俗语，“要想公道打个颠倒”，如今医患关系如此紧张，就是因为缺少换位思考。人与人之间，当你感到焦急、难过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了别人也会有同样的心情，甚至这种心情会超过你的感受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老太太夫妻俩一样宽容，那么世界会是多么温馨啊！



野马  
摄/吴海鹏

# 昔日工友

文/王慧琪

我20岁那年(1974年)，被分到家乡的一家纺织厂学徒。一些当时的人和事还大体记得，突然就生了一写他们的念头。

## 杨排

那时候的工厂像是延用了部队的模式，车间称作“连”，车间主任叫“连指导员”；低一个等级谓之“排”，也就是现在班组的意思。我所在的前纺车间有三个排，分别轮着“三班倒”。每天交接班的那十几分钟里能碰到另一个排的工友。

我们的排长姓杨，大伙儿叫他一般把后面那个“长”字省了。那时他也就三十来岁吧，人生得瘦，爱戴一顶洗白了的旧军帽（主要还是因为工作时，棉絮在机器里轧松后扬出的灰尘太大）。话不是太多，班前班后的会也都是三五句结束。为人挺实诚，哪个工友家里有什么事了，只要同他讲，他一准会明里暗里地使劲给帮忙。他结婚好几年了，有一个男孩，七八岁的样子，曾带到车间过，挺可爱，长得很像杨排，小嘴也有点瘪。他的家在三十里外的朴

席乡下，平时很少回去，也就插秧割稻那几天，他会赶回去忙一阵。除此之外基本是以厂为家了。车间里百分之八十是女工，年纪大一点的都叫他小杨。时不时地被这些老大姐吆喝着接接手，换她们去吃饭或上厕所啥的。上路子的去去也就来了，碰到资格老的脸皮厚的，一趟厕所能上半个多小时——一帮子人躲在厕所上张家长李家短了。一会儿人过来了，杨排还不太好意思说什么，总不能问人家你在那都干了点啥吧。

我新来乍到的，杨排对我挺照顾。有点什么文字的活，他也总找我。那晨光，一个高中生也算个小秀才了。我干的是保全工，也就是负责纺机的保养和维修。有时候空下来，会被一些女工抓抓差，临时顶替她们一阵子。而这种事让杨排碰上，他会护着我，说上女工几句。

吃饭时杨排会拉上我一道走。赶上人多，七八个窗口都排了好长的队。印象中最好吃的一个菜是黄芽菜炒肉丝。食堂锅大，火足，芽菜炒得脆脆软软的，肉丝也不老；起锅时想必放了点芡粉，汤汁稀稀稠

稠的，特别下饭。杨排和我都爱要这个菜。

刚进厂那会，我还会骑自行车，杨排听说后，把自己的一辆车借给我学。下了小夜班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，他不顾一天工作的疲劳，帮我扶车把，稳后座，奔前忙后地连教了好几个晚上。

## 黄师傅

他是我正宗的师傅。记得是连指导员和杨排一道，把我带到他面前，有点组织意思地交代他负责带我，教会我修理技术。我跟他后面看，看他给每一台并条机、纺纱机加油，机台前后的油眼都在哪儿，不同部位的油眼吃油量是不同的；再就是看他修机子，小故障大问题都从哪些地方入手。车间里的机器大都是1890年英国造的，到那会已是八十开外的“老牙货”了，因此各种毛病可谓接踵而至。刚修好了这一台，那边又听见叫黄师傅了。才学那一阵，上班到下班，我身上的衣服，汗就没干过。干这活，不但要有一把死

力气(那机身后面的大铁砣，重达两百斤左右，修理时得卸下来，弄好后还得挂上去)，还须眼疾手快脑子飞转——黄师傅处理故障常有些小门道小诀窍，却并不说得很清楚，全靠你自个儿意会，用心去记。

他年纪不大，顶多不超过四十，但在厂里算老师傅了。个头不太高，微胖。笑起来有点深藏不露。工作虽与女工打交道，但无一多余的的话，修完了机子便走人。看得出不少人都有点惧他。对我这个徒弟，他还算客气，没弄出什么难堪的事儿。虽没行过拜师礼，但架子多少还是搭一点的。两三个月后他基本放手，让我独当一面。碰到上夜班，他会寻一僻静处打打瞌睡。遇到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去叫他，他不慌不忙地跟了来，让我当着他面再试一遍，而后也不多说些什么，只是笑笑，一阵捣鼓后，把故障就给除了，而内里的一些关节他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。后来自己琢磨，或许师傅就是这么当的，更多的东西留给你去慢慢悟。■